

# 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效应

孙学峰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持续了40年的美苏对峙趋向缓和,以反对苏联扩张为基础的中美战略合作逐渐失去了动力。此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对美政策也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和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sup>①</sup>:(1)分析中国对美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sup>②</sup>(2)从考察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入手,描述中国对美政

---

<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一些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特别重视研究中国未来的政策意图,并据此提出美国的相应对策。由于这些研究与本文研究问题的关联性较弱,而且已有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综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傅梦孜:《中国崛起:美国的基本评估及对华政策论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20—25页;Thomas 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5—10。

<sup>②</sup> 参见王伟光:《困境与选择:冷战后中国对美外交》,《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78—87页;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65—77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总第1期),第1—23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策,预测其发展方向或分析政策原因。已有文献中对这类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sup>①</sup> (3) 描述中美关系的互动过程,其中涉及有关中国对美政策的评价。根据涉及的时间范围,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某个特殊阶段两国政策的互动过程,如1995—1996年台海危机<sup>②</sup>;另一类关注的则是较长时期内(10年以上)中美政策的互动过程。<sup>③</sup>

从整体上看,已有的研究更注重描述中国的对美大战略,分析中美关系的演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中国对美政策实际效用的评估,即使有所涉及也不够深入,突出表现为:划分中国对美政策类型的方法不够明确,使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评估政策效应的标准较为模糊,相关评价基本是就事论事,不利于人们清晰认识中国对美政策效应的一般规律;没有揭示中国对美政策效应的一般规律进而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1989年以来中国缓解美国外交压力的实践展开,力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 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2) 相关政策起到不同效果的原因何在?

全文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划分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类型的方法,说明评价政策实际效果的标准和方法;第二部分考察冷战后中国缓解美国压力的四个案例,具体评估相关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部分对中国对美不同政策实际效果的差异作出理论解释;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分析其政策含义。

---

① 参见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11、142—174页(英文原文可参见<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21/>);时殷弘:《中美外交和战略15年:演化过程、基本经验和尚存问题》,《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1—6页;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8—13页;杨洁勉:《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104页;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79页。

② 参见 Robert Ross,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87—123;赵福生:《从和平攻势到强制战略:由北京的认知变化看1995—1996年台海危机》,《亚洲评论》,1998年秋冬卷,第8—29页。

③ 参见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ang Jisi and Wang Yong, "A Chinese Account: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ies" in Ramon Hawley Myers et al.,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269—295;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 一、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类型和评价标准

### (一) 政策分类

对外政策是一国对外行为的行动准则和行动计划,其目标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必须能够影响其他行为者的行动,因为国际体系中所有利益都无法实现真正平等的分配,每个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益目标。<sup>①</sup> 施加影响的能力必须依靠实力资源,并选择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实力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安全资源,如军事实力、盟友、国际政治组织或安全组织的表决权等;二是经济资源,如整体经济实力、市场规模、市场准入权力等。使用方式上,霍尔斯特(K. J. Holsti)列举了六种:使用武力、以暴力方式施加惩罚、以惩罚相威胁(大棒政策)、给予奖赏(胡萝卜政策)、悬赏和劝说。<sup>②</sup> 但上述六种方式可以简化为两个类型:积极诱导和消极惩罚。

根据上述两个标准,可以划分出中国对美政策的四个基本类型:

表-1 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类型

	安全资源主导	经济资源主导
积极诱导	战略安抚	经济诱导
消极惩罚	战略强制	经济制裁

四类政策的核心内容分别是:(1) 战略安抚。利用中国掌握的安全资源,配合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安全利益,借此实现利益交换,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消极认识,推动美国取消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2) 战略强制。利用中国掌握的安全资源,阻挠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安全利益,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形成对抗性同盟牵制美国力量、在国际组织中否决有利于美国的提议,以迫使其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3) 经济诱

<sup>①</sup>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15页。

导。利用中国掌握的经济资源,如市场规模、市场准入等,为美国实现相应利益提供便利条件,满足美方经济需求,借此实现利益交换,推动美国取消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4)经济制裁。利用中国掌握的经济资源,阻挠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利益,如贸易禁运、设置贸易壁垒等,迫使美国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任何国家实际执行的政策都是多种策略的组合,因此上述分类无法与中国实际奉行的战略完全吻合,但可以较为客观地描述中国针对某一事件、问题的主导策略。所以,依据上述分类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能够实现研究目标。

### (二) 评估标准和方法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检验政策的最终标准是成功与否,而成功的定义是,国家生存得以维持;国家实力得以增强。<sup>①</sup>根据沃尔兹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的可操作标准,重点考察中国政策对美国实际行为的影响,并按照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将政策效应分为三个等级,具体标准如下:

(1) 显著。美方明确承诺将终止威胁中国生存安全、损害中国实力发展的行为,并采取了实质性行动,如削减对台湾出售武器、解除制裁措施等。

(2) 一般。美方重申有利于中国安全、有助于中国实力发展的承诺,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并采取适当行动减轻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如改善政治关系等,但仍然执行部分威胁中国生存安全、损害中国实力发展的行动,如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3) 不显著。美方继续执行威胁中国生存安全、损害中国实力发展的行为,或改变有利于中国安全、有助于中国实力发展的基本政策,采取行动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如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提高售台武器质量等。

为了保证对政策实际效果测量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本文采取了如下方法:  
(1) 选择冷战后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最为明显的阶段、双方矛盾最为尖锐的问

---

<sup>①</sup>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题领域作为研究案例,原因是在这些阶段和问题上,双方的政策措施较为具体,如明确宣布执行或取消制裁措施,因而易于描述双方初始政策及其变化,有助于较为准确地判断政策效果。(2)重点考察中国政策执行1—2年后,美国实际行为的变化,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3)尽可能利用能直接证明政策效果的经验证据,如决策者的行为和言语;倘若难以发现类似的经验材料,则尽可能使用共识程度较高的经验材料,作为分析性推论的基础。

## 二、中国对美政策的实际效果

本部分将讨论四个案例。<sup>①</sup>它们是贯彻战略安抚政策的两个案例:摆脱孤立和制裁(1989—1992年)、争取美国遏制台湾独立(2000—2004年);贯彻战略强制政策的案例:应对美台关系变化(1995—1996年);以及贯彻经济诱导政策的案例:促使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3—1994年)。

### (一) 战略安抚

#### 1. 摆脱政治孤立和制裁(1989—1992年)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Bush)于6月5日和20日先后宣布制裁中国的措施,主要包括:(1)暂停一切政府间已同意的对华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2)暂停美中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3)停止助理国务卿以上级别官员的高层互访;(4)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援助和贷款等。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再次作出制裁中国的决定。世界银行在宣布推迟审查约2.3亿美元的对华贷款后,推迟考虑对华提供的新贷款项目达7.802亿美元。<sup>②</sup>

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的基本政策是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稳住阵脚主要指国内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韬光养晦则是指对外行为中从自

<sup>①</sup> 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也是说明经济诱导政策的案例。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详细考察,可参见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 183—188。冷战后中国没有利用经济制裁政策实现对美的政治、安全目标,因此本文没有相关案例。

<sup>②</sup>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4、597页。

己的实际力量出发,不带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尽可能把握外交的主动权。<sup>①</sup>为此,中国利用相关国际事件提供的机会,针对美国的实际利益关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中美合作:

(1) 没有否决美国出兵海湾地区。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组建了多国部队力图使用武力恢复科威特的主权。为顺利获得联合国的批准,美国希望中国支持其在海湾的战争行动。中国虽不赞成使用武力,但也没有坚决反对,中美两国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突出表现是从1990年8月2日到1991年4月3日,安理会共通过14项关于海湾危机的决议,中国对其中12项投了赞成票,而在授权联合国出兵海湾的678号和686号决议表决中,选择了弃权,没有投票否决,为美国组成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提供了道义和法律基础。<sup>②</sup>

(2) 加入核不扩散体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一直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应对地区性冲突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挑战,美国愈加重视武器扩散问题。1989年后,中国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面否定核不扩散体制。1991年8月,中国总理李鹏宣布,中国政府原则上决定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3月,中国正式签署了该条约。<sup>③</sup>此外,1991年11月,中国同意以美方取消1991年6月对华三项制裁为条件接受《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指导原则。<sup>④</sup>

(3) 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1990年7月,美国调整了对柬埔寨政策,其核心目标之一是阻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历史上,中国曾与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反洪森政府联盟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向其供应武器。<sup>⑤</sup>但199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确定了柬埔寨问题的基本框架后,中国停止了对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军事援助,并宣布在柬埔寨全国委员会正常运转后,平等对待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② 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第60页。

③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20页。

⑤ 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第70—71页。

柬埔寨各方<sup>①</sup>,红色高棉能否掌权,中国政府不会过多干涉。<sup>②</sup>

中国的合作姿态和协调行动取得了成效。1989年7月,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同中国外长钱其琛举行了会晤,后来在联合国和开罗也有过会晤。尽管美国不认为这些会晤意味着解除了高层接触的禁令,但事实上的会晤已经存在了。<sup>③</sup>1990年11月,为感谢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的支持,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同钱其琛举行了会谈。这是1989年6月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美国总统同中国部长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否决了众议院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议,这无疑也与海湾危机期间有求于中国有关。<sup>④</sup>1992年3月,美国总统表示,“中国同意……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方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那将无益于美国政策的实施。<sup>⑤</sup>

继1989年12月美国宣布取消部分对华经济制裁后,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陆续取消或松动。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时表示,此次访问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来华本身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级接触的禁令。<sup>⑥</sup>1992年1月,李鹏总理在联合国总部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会晤。<sup>⑦</sup>1992年底,美国正式宣布解除高层接触的禁令。此外,美国还取消了部分制裁项目,国际组织的对华贷款也逐步恢复。尽管此后美国还利用最惠国待遇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此时已没有政治制裁的性质了。<sup>⑧</sup>

### 2. 争取美国遏制台湾独立(2000—2004年)

1999年7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出“两国论”,明确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8月,“两国论”写入国民党文件。<sup>⑨</sup>2000年3月,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候选人

①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410页。

② 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第71页。

③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460—461页。

④ 苏榕:《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13—614页。

⑤ 同上书,第622页。

⑥ 同上书,第620页。

⑦ 贾庆国、汤炜编著:《棘手的合作》,第93—94页。

⑧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462页。

⑨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2002年8月,陈水扁首次明确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sup>①</sup>。台湾走向“法理独立”的步伐逐步加快。与此同时,2000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G. W. Bush)采取了明显倾向台湾的政策。2001年4月,美国允诺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Kidd)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机潜艇和12架P-3C反潜巡逻机,武器质量之高此前从未有过。在接受采访时,布什表示“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此外,不再提克林顿(Bill Clinton)“三不”政策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即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还向台湾保证至少2001年不再提台湾反感的两岸政治对话问题。<sup>②</sup>

面对美国政策的变化,中国在充分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决心的同时,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争取美国采取实质性行动遏制“台独”。主要做法包括:(1)保持克制。针对2001年美国提高售台武器质量,中国基本没有采取报复或威胁做出报复的行动。中国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反对也较有节制。<sup>③</sup>(2)促进合作。“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战争打击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对塔利班的战争中,中国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对于伊拉克战争,中国虽不支持,但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决议时<sup>④</sup>,没有采取与美国强烈对抗的态度。2002年10月,朝核问题激化之后,中国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促成了2003年4月的北京三方会晤和8月的六方会谈。此外,2002年8—11月,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军控管制条例,并完成了防扩散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sup>⑤</sup>,这与“9·11”以后美国愈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不无关系。

① 《陈水扁首次公开叫嚣:公民投票改变台湾现状》, <http://www.cctv.com/special/670/1/40284.html>。

② 陶文钊:《布什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http://www.cass.cn/meiguosuo/show/show\\_project\\_le.asp?id=552](http://www.cass.cn/meiguosuo/show/show_project_le.asp?id=552)。

③ Wang Jisi, “China’s Reaction to G. W. Bush: Tactical Moves, or A Strategic Reorientation?”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U. 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 New Paradigm or Continuing Modalities* (Claremont, Calif: Keck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2), pp. 143—144.

④ 包括1441、1472、1483、1500、1511号决议。

⑤ 三个条例分别是《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与之配套的管制清单、《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管制清单、《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理条例》及管制清单。此外,修订了《军品出口管制条例》并颁布了管理清单。参见陶文钊:《布什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中国的克制和合作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为两国政治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sup>①</sup>,但在争取美国共同遏制“台独”方面效果并不明显。2002年2月,布什访华期间,没有重复美国在中美三个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而是几次援引了明显有利于台湾的《与台湾关系法》。<sup>②</sup>3月,台湾的“国防部长”汤曜明前往佛罗里达参加“国防峰会”,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进行长达100分钟的会晤,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也与汤举行了“短暂公务会谈”,这在台美“断交”后极为罕见。<sup>③</sup>尽管2003年12月布什强烈反对陈水扁进行“统独公投”,但美国的实际行动却明显向台湾倾斜。2004年4月2日,在台湾大选结果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超高频早期预警雷达在内的先进武器。<sup>④</sup>4月底,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新加坡发表讲话,认为在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美国不反对两岸改变现状,但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双方同意的方式”。这表明美国对“台海现状”的定义是没有战争,与中国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定义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支持台湾“独立”政策的公开化。<sup>⑤</sup>

### (二) 战略强制:应对美台关系变化(1995—1996年)

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调整对台政策,立场愈加倾向于台湾。199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明显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有关规定。<sup>⑥</sup>克林顿执政之后,美台关系进一步密切。1994年4月,克林顿签署了国会《国务院授权法》,其中包括有关《与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

---

① 主要表现包括2002年9月30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与中国等大国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对朝核问题上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也表示感谢。参见陶文钊:《布什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Michale Swaine, *Reverse Course? The Fragile Turnaround in US-China Relations*, <http://www.ceip.org/files/pdf/Policybrief22.pdf>。

② Wang Jisi, "China's Reaction to G. W. Bush," p. 148.

③ 刘宏:《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179294.htm>。

④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新计划:中国强烈不满,指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6/taiwan020404.html>。

⑤ 《美支持“台独”的公开化》,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6/taiwan290404f.html>。

⑥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40页。

七公报》的国会声明。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调整对台政策”框架。尽管美国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其中大多数内容明显有利于台湾。<sup>①</sup> 12月,美国交通部长佩纳(Pena)访问台湾,与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和“外交部长”钱复举行正式会谈。<sup>②</sup>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同意李登辉赴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会,这是中美建交16年来美国政府首次允许台湾在任领导人访问美国,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sup>③</sup>

中国对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斗机和“对台政策新框架”,只提出了有限的抗议,认为美国依然尊重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政策的变动是政府对政治压力做出的微小让步。<sup>④</sup> 但李登辉获得访美签证,改变了中国此前的认识,对美政策日趋强硬。1995年5月,中国决定推迟国防部长迟浩田的访美计划。美方决定公布后,中国立即中止了国务委员李贵鲜、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对美国的访问。6月17日,召驻美大使李道豫回国述职。7月21—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公海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演习。8月15—25日,在台湾以北90海里处进行导弹和火炮实弹演习。10月,在中国领海举行诸兵种合成演习。1996年3月8—25日,又在东海沿岸和台湾海峡先后举行导弹发射训练、海军实弹实兵演习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sup>⑤</sup>

中国的强制政策收到了效果。克林顿政府意识到台湾分离主义的危险性,美国必须加以制止。原来质疑行政当局“为何不承认台湾”的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转变了态度,认为对台湾的支持必须小心加以对付。<sup>⑥</sup> 1996年3月,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取消了原定4月在马祖地区进行的“万平防护射击演习”和

---

① 主要包括规定美国将与台湾进行更高级别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美国;举行定期内阁副部长级经济对话,谈判签订贸易投资架构协议;支持台湾加入不限以国家为基本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台湾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合法作用和声音”;允许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副处长等所有职员进入台湾“外交部”洽谈公务;允许美国经济及技术内阁成员,通过在台协会安排与台湾代表在官署会晤;美方同意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等。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29—730页。

② 赵穗生:《从和平攻势到强制战略》,第20页。

③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39页。

④ 内森·罗斯:《长城与空城计》,第80页。

⑤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40—748页。

⑥ 赵穗生:《从和平攻势到强制战略》,第24页。

原定5月上旬进行的“汉光12号”三军实兵对抗演习。<sup>①</sup>1996年末和1997年,美国重新审视对台政策,提出“新三不”政策,即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他主权国家组织,其立场从逐步倾向台湾转变为某种程度上与北京保持现状。<sup>②</sup>美国还主动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96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Anthony Lake)访华时,表示美国愿意恢复中美高层互访。11月,连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关系”<sup>③</sup>。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克林顿还在访问中国期间公开重申对台“新三不”政策。

但美国的部分行为依然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1996年3月10—11日,美国先后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的国际海域,表明应对台海危机的能力和决心。1997年和1998年,美国依然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签约额和实际交货额都呈上升趋势。1997年美台军售签约额是3.54亿美元,实际交货额为2.16亿美元,1998年则分别上升为4.41亿美元和15亿美元。美国还通过美日防卫指针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台湾纳入其在亚太的安全网络。<sup>④</sup>

### (三) 经济诱导:促使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3—1994年)

1993年2月,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阐述了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即利用贸易最惠国待遇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推进民主进展。5月,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将对华最惠国待遇再次延长一年,但次年是否延长“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上取得重大进展”。他列出了七项要求:包括两项“必要条件”,(1)中国满足1974年贸易法关于自由移民的有关规定;(2)中国遵守1992年中美关于犯人劳动的双边协定;以及五项“重要条件”;(3)中国采取步骤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4)释放因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遭监

<sup>①</sup>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51页。

<sup>②</sup> 陈兼:《冷战后时期北京的对台政策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路》,《亚洲评论》1998年秋冬卷,第41页。

<sup>③</sup>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52页。

<sup>④</sup> 杨洁勉:《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调整》,《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外交》2000年第5期,第6页。

禁的或拘留的人员并对他们的情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5) 保证犯人的人道待遇，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视察监狱；(6) 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7) 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中国广播。<sup>①</sup>

为了促进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延长，中国在顶住政治压力的同时，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1993年4月，在美国审议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派团赴美，采购汽车、飞机，一次性采购金额就高达10亿美元。<sup>②</sup> 中国还积极鼓励美商来华投资。1992年和1993年第一季度，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摩托罗拉等公司在中国签下了一批获利丰厚的合同。<sup>③</sup> 同时，中国开展多边经济外交，积极吸引其他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促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1993年11月，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期间德国公司获得了三十多亿美元的订单。法国则顶替对华出口管制的美国成为中国核电站建设的主要伙伴。<sup>④</sup>

中国的经济诱导政策效果显著。巨大的在华利益迫使美国大公司不得不设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中商会主席曾表示，“美国的利益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而“在促使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的过程中，美国工商界必须积极参与”。因此，1994年，要求美国政府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公司达到800余家。<sup>⑤</sup> 1992—1993年，德、法在华获得较大收益给美国工商界不小的震动，美国政府官员也意识到自己的盟友不愿向中国施加压力，而是充分抓住美国丢弃的商业机会。<sup>⑥</sup> 美国逐渐发现，借最惠国待遇向中国施压，不但对自身利益没有好处，也使自己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1994年5月，克林顿被迫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直接否定了一年前的基本政策，以经济高压手段迫使中国作出政治让步的政策失败了。<sup>⑦</sup> 此后，两国因人权问题引起

①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72—673页。

② 同上书，第694页。

③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 40.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92页。

⑤ 同上。

⑥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 40.

⑦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95页。

的争论暂时缓和,人权问题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sup>①</sup>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发现:(1) 战略安抚政策缓解安全压力,如台湾问题,效果并不明显,2000年以后争取美国遏制“台独”的效果不显著就是例证,但这一策略化解政治压力还能表现出效果,而且20世纪90年代初的效果更明显一些。(2) 在安全压力(台湾问题)方面,中国尝试过战略强制策略,使用的措施较为温和,效果虽然一般,但要强于战略安抚。1995—1996年中国应对美台关系变化的外交实践就是较有说服力的例证。(3) 经济诱导政策解决经济分歧和与之相关的政治矛盾效果明显,突出的例证是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中国没有使用过经济制裁政策应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分歧或政治安全矛盾。

表-2 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实际效果

	执行时间	政策目标	问题性质	实际效果
战略安抚	1989—1992	打破政治孤立和制裁	政治	一般
	2000—2004	争取遏制台湾“独立”	安全	不显著
战略强制	1995—1996	争取遏制台湾“独立”	安全	一般
经济诱导	1993—1994	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经济	显著
经济制裁	∅	∅	∅	∅

### 三、中国对美政策实际效果的理论解释

如何解释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实际效果的差异? 本文认为,核心因素有两个:第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即两极结构解体,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惟一的超级大国;第二,在一超多强的结构下,中国成为普通大国中相对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

<sup>①</sup> 牛军:《转型中的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外交》2000年第5期,第3页。

(一) 冷战后中美相对实力发展趋势

1. 美国确立主导地位。1989年以后,美国的相对实力<sup>①</sup>优势日趋明显,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成为国际体系中惟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实力方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比一直超过40%。1996年后,所占比重还逐步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近47.9%。一直位于第二位的日本,在差距最小时,也仅为美国的62.3%(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相对比已降至46.5%。在军事实力上,美国的优势更为明显。苏联解体后,其军费开支的相对比一直超过60%,即比其他六个主要国家的总和还高。1991年以后,军费开支一直居于第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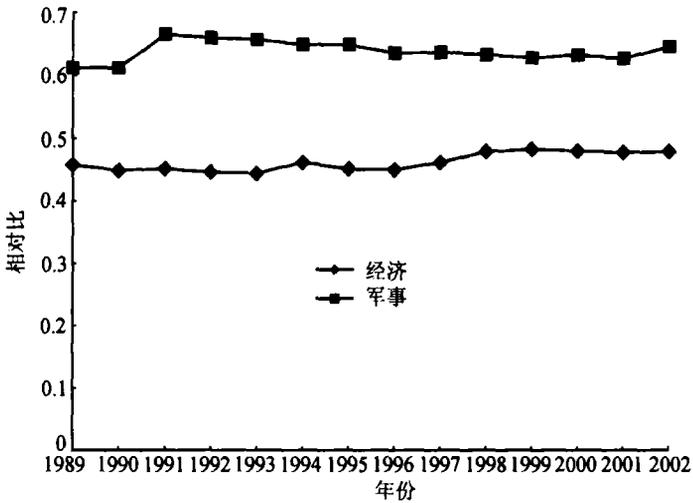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相对实力(1989—2002年)

<sup>①</sup> 相对实力包括两个指标,即相对军事实力和相对经济实力。计算方法分别是:相对军事实力 = (一国军费开支/七个主要国家军费开支之和) × 100%; 相对经济实力 = (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七个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 100%。七个主要国家是:中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1989—1991年为苏联)、英国和美国。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文中所有有关相对实力的数据均依据SIPRI的基础数据计算得到。基础数据见 [http://web.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http://web.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注册后即可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依据军费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推算得出。此外,基础数据没有提供苏联1991年的军费开支。本文没有使用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即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rms Transfers (WMEAT), 1999—2000, 见 [http://www.state.gov/t/vc/rls/rpt/wmeal/1999\\_2000/](http://www.state.gov/t/vc/rls/rpt/wmeal/1999_2000/)。原因有两个:第一,数据不完整,没有2000—2002年的数据。第二,对中国的实力估计偏高。因此,笔者认为,使用SIPRI的数据检验论文的理论逻辑,说服力更强。

的日本,在差距最小时,也仅为美国的 15.7% (1998 年)。

2. 中国相对实力上升。1989 年以后,中国的相对实力呈上升趋势,而且是六个普通大国中,上升趋势最明显、速度最快的国家。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实力的相对比由 1989 年的 2.4% 逐渐上升到 2002 年的 5.8%,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7%。同期其他五个普通大国中,法、德、英三国呈上升势头,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0.2%、0.6% 和 0.55%。日本和俄罗斯呈下降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1.3% 和 -7.8%。中国军事实力的相对比,1989 年是 1.6%,2002 年则上升至近 5.4%,最高时达到 5.7% (2001 年),年平均增长约为 9.6%,同期其他五个普通大国中,法、日两国呈上升势头,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0.18% 和 2.2%,德国、俄罗斯和英国三国呈下降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1.6%、-13.3% 和 -0.8%。

但中美的实力差距仍然相当明显。在相对经济实力方面,2002 年中国仅占美国的 12.1%;相对军事实力方面,2002 年中国仅是美国的 7.9%,最高时也只有 8.9% (2001 年)。客观地讲,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中国和美国都不在同一个等量级上,而军事实力的差距更为明显。更需要注意的是,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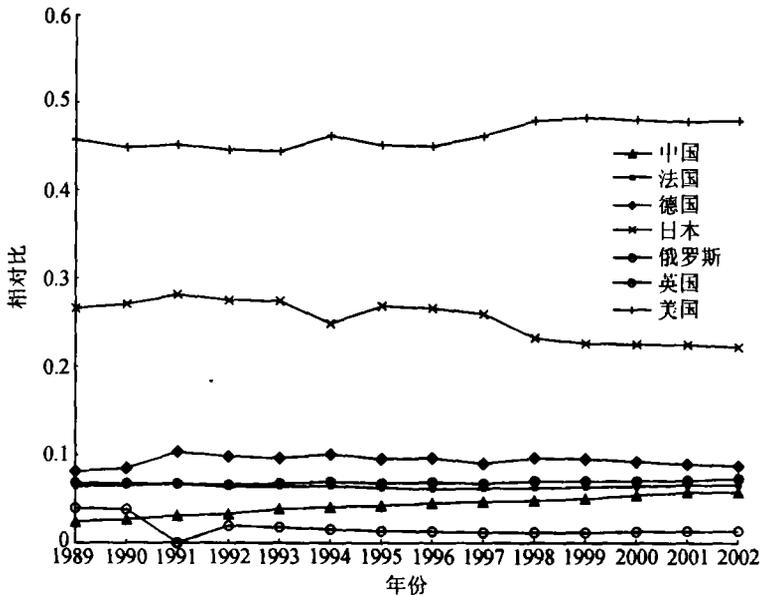


图-2 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 (1989—2002 年)

后中国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1989年,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为7.27万亿美元,此后逐渐增加,到2002年已增至8.83万亿美元。2000年以后,两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差距也呈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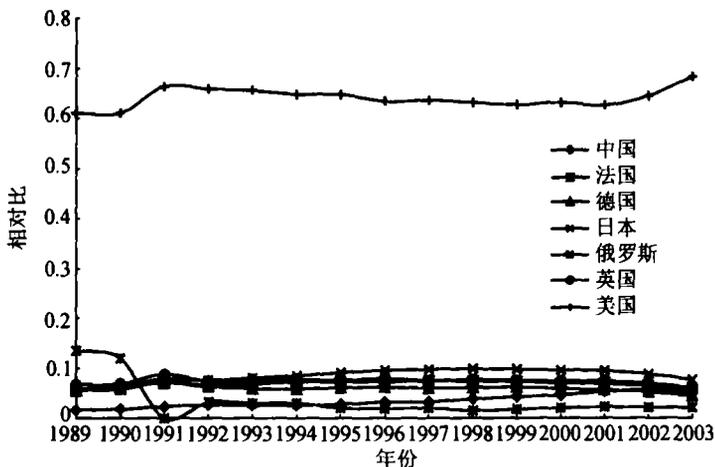


图-3 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对军事实力 (1989—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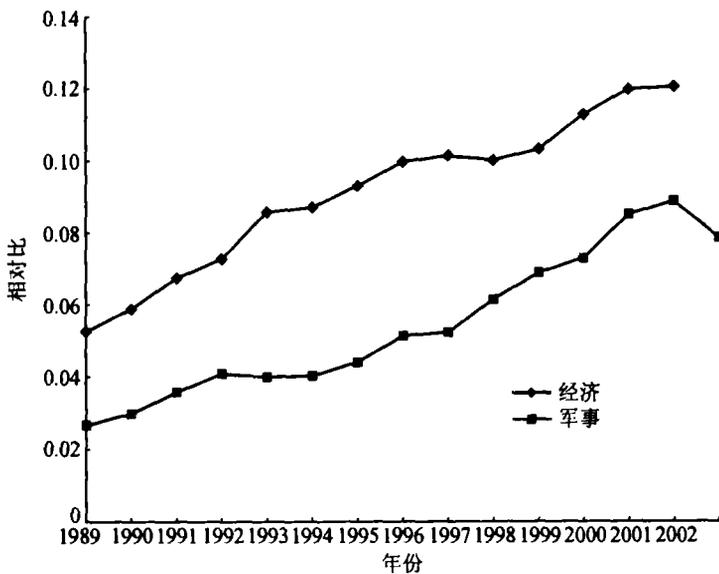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相对实力占美国相对实力的比例 (1989—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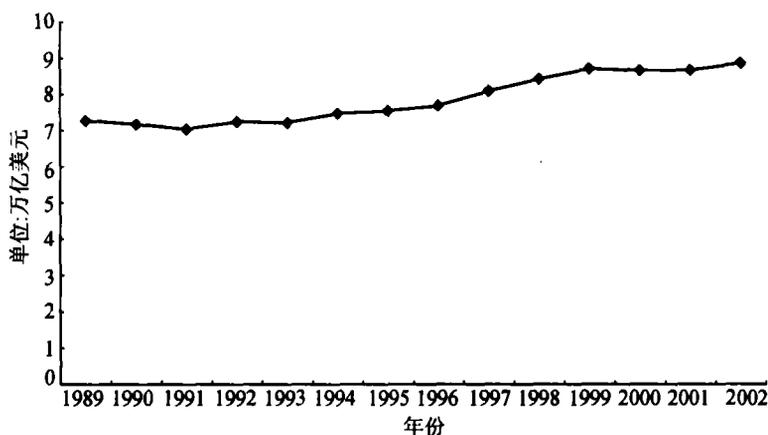


图-5 中美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距(1989—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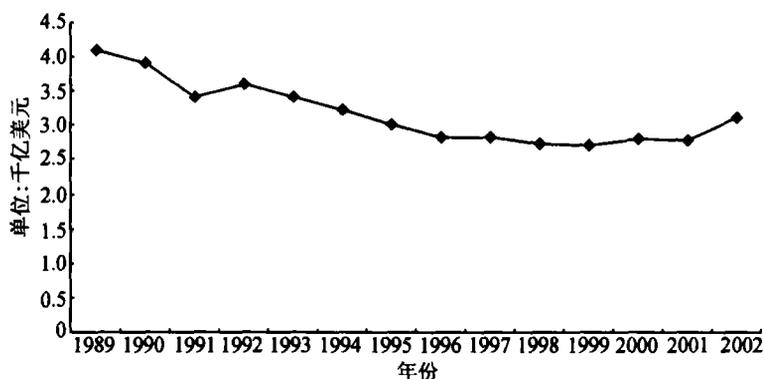


图-6 中美军费开支的绝对差距(1989—2002年)

## (二) 中美实力地位变化对中国对美政策效果的影响

1. 战略安抚:美国防范中国和对中国需求下降导致战略安抚难以缓解安全压力。

(1) 防范中国。中国相对实力的上升导致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增强,并逐渐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开始关注中国对其主导地位可能带来的威胁。199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大。如果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速度再

维持 10 年,那么……20 世纪末在战略上最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兴起。”<sup>①</sup> 1997 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在 21 世纪潜在的全球竞争对手之一。<sup>②</sup> 2001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明确说明,除了巴尔干,欧洲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俄罗斯对北约不再构成大规模常规军事威胁,而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sup>③</sup> 报告中“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指的就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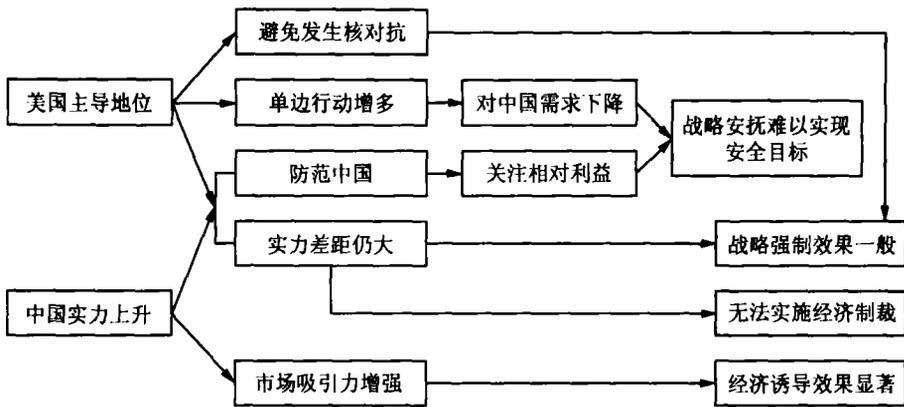


图-7 中国对美政策实际效果原理图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采取行动牵制中国,防止中国获得相对收益。1989 年 6 月之后,中美军事技术合作中断,此后,尽管两国总体关系几度好转,军事交往也大体恢复,但美国再也没有向中国出售先进军事技术,甚至一些不具有军事技术意义的对华销售也受到阻碍。<sup>④</sup> 1992 年之后,美国全面调整对台政策,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政治上提升美台关系,制造适度的台海局势紧张,拖延中国统一进程,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sup>⑤</sup>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在裁减核武器总量和瞄准俄罗斯核武器数量的同时,却增加了瞄准中

① 楚树龙:《冷战中中美关系的走向》,第 44 页。

②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p. 5.

③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001), pp. 3—4.

④ 李彬:《绝对获益、相对获益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1 期,第 20 页。

⑤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第 144 页。

国核武器的数量,其目的是不希望中国从美俄双边核裁军中获得相对利益。<sup>①</sup>

(2) 对中国安全需求下降。苏联威胁的逐步消失,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性逐步降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使其依靠自身力量维护核心安全利益的倾向愈加明显,在安全问题领域对其他大国和联合国合作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从而削弱了中国利用联合国表决权等安全资源进行利益交换、实现安全目标的能力,战略安抚政策的效果也逐渐减弱。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当美国直接的国家利益遇到最大危险时,美国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些利益是由我们的安全需要确定的”<sup>②</sup>。1999年和2003年打击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之前,美国虽努力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但在其方案无法获得通过时,美国都绕开了联合国,联合其他多边组织或部分国家,采取武装打击行动,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2002年,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障碍,继续扩大其军事实力优势。

但在苏联完全解体之前和此后不久,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首要担心还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走向及处理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更多的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即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政治剧变后,能否顺利完成权力交接,能否坚持改革开放<sup>③</sup>,因而中国奉行战略安抚政策,争取美国的合作,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合作,还能表现出效果。1989年年底,美国副国务卿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必须同中国保持接触,因为从全球战略角度,虽然美苏缓和,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战略价值并没有削弱。<sup>④</sup>这表明在苏联的前途没有彻底明朗之前,美国依然比较重视中国的作用,仍然希望从某种程度上维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即使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依然存在,因此美国继续执行同中国接触的政策,利用中国对付尚未消失的苏联威胁。<sup>⑤</sup>因此,1989—1992年的战略安抚政策还能够取得效果,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① 李彬:《绝对获益、相对获益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第20页。

② 阎学通等:《中国与亚太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③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April, 1990, p. 4. 转引自吴心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262>。

④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609页。

⑤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57—58页。

由于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愈加关心中国的安全领域的相对收益,同时中国的战略作用呈下降趋势,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战略安抚难以有效地缓解安全压力,如不能有效争取美国遏制台湾的“独立”倾向,因为美国担心安全领域的合作会使中国获得过于明显的相对收益,不利于其维护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利用战略安抚政策取得安全领域的收益愈加困难,即使在“9·11”事件之后,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2001年9月,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美国是否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支持和理解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的要求做出善意的回应并减少对台湾的支持,鲍威尔答称,在反恐问题上,绝对没有对等交换的可能,意指美国反恐统战不与对台政策挂钩。此后,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也公开表示,反恐斗争“决不能成为迫害少数民族的借口”<sup>①</sup>。

2. 战略强制:美国希望避免核对抗和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决定了战略强制效果一般。

美国的优势地位促使其尽可能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的稳定,避免与主要核国家发生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引发体系战争,以巩固和延长其霸主地位。因此,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安全问题上,如遏制“台独”势力发展,中国采取适度的战略强制,既表现维护国家生存的决心和能力,又能说明战略目标的有限性,因此能够迫使美国采取一定的合作行动,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其效应要强于战略安抚,因为战略安抚会使美方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问题上容忍美国的立场,因而其执行相关威胁中国生存政策的决心更大。1995—1996年中国的政策实践就是典型的例证。

1996年,中美在台海的军事对峙使美国意识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核冲突,美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必须有限度,军事上支持台湾独立是有风险的。此后,克林顿明确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并采取实际相关行动,同时改进两国政治关系。而1995年5月李登辉访问美国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调整对台政策都保持了克制。在讨论是否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后中国可能会有三种反应:(1)采取

---

<sup>①</sup> 张睿壮:《布什对华政策中的“蓝军”阴影》,《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页。

可能“危及”中美关系本身的措施,包括召回大使等激烈行动;(2)在另一些领域采取行动对美国予以报复;(3)提出措辞强烈的抗议,但不会采取过激行动。国务院的最终判断是,上述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此,如果决定邀请李登辉访美,美国所承担的风险还是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结果导致美国总统最终作出了同意李登辉访美的决定。<sup>①</sup>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决定了中国的强制政策效果不会十分显著。中国军队人数虽然最多,军费开支也在增长,但整体军事力量比美国至少落后15—20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奈(Joseph Nye, Jr.)认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接受过打现代战争的训练。中国军队的信息能力尤其落后,而在21世纪,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恰恰就是信息能力。也许再过20年,中国会达到美国现在的军事水平。但到那时,美国肯定又向前发展了。<sup>②</sup>军事实力客观上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只有在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才能使用战略强制策略,而且也十分温和,效果也较为一般。

3. 经济诱导和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决定了经济诱导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压力;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决定了中国无力实施经济制裁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投资机会日渐增多,巨大的市场吸引力增强了中国通过经济资源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其结果是经济诱导政策可以有效地解决中美经济分歧,具体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中国的市场机会,让其他发达国家乘虚而入,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1994年,美国放弃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都是较有说服力的例子。<sup>③</sup>

此外,冷战后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决定了美国在经济领域同中国合作,中国的相对收益远不如安全领域明显。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美中贸易的扩展对美国经济的总影响是积极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90%原先也是从别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只有10%取代了美国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和工人在从对华出口中得到很多好处。拉迪(Nicholas Lardy)也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将继续在各种经济领域,包括飞机、电

①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737—738页。

②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37页。

③ 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的过程,可参见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 183—188。

机、锅炉和建筑材料,大量购买美国资本的货物。中国还可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大买主。<sup>①</sup>

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特别是两国的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几乎不可能采取经济制裁政策。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依赖性。1989—199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一直高于25%,1998年达到38.7%(中国统计的数字分别为8%和20.7%)。相比较而言,美国对华贸易的依赖性则要低得多。1989—1998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5%—2%之间。<sup>②</sup>此后,中美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量的比重虽逐渐增大,但到2003年也仅为7%左右。<sup>③</sup>因此,中国不大可能采取经济制裁的策略来维护利益,尤其是实现政治和安全目标,即使使用了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 四、结 论

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冷战期间以对抗苏联为基础的战略合作不复存在。中美之间的分歧逐步显现出来,结构性矛盾日趋突出。为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缓解美国施加的压力,中国实施了不同的对美政策。从实施效果看,战略安抚政策缓解安全压力的效果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但这一策略应对政治压力能显示出效果,尤其是在苏联没有完全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初,效果更明显些。战略强制应对1995—1996年美台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取得了成效,说明在应对涉及中国生存的安全问题上适度的战略强制效果要好于战略安抚。经济诱导政策成功地使美国放弃了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说明这一策略在化解经济压力及相关的政治矛盾效果显著。中国没有实施过经济制裁政策,以缓解美国的政治安全压力。

中国对美相应政策出现不同效果的核心原因在于冷战后中美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惟一的超级大国,其体系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中

①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478—479页。

②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 380.

③ 《中美贸易及投资最新统计》, [http://us.mofcom.gov.cn/article/200203/20020300003584\\_1.xml](http://us.mofcom.gov.cn/article/200203/20020300003584_1.xml)。

国相对实力逐步上升,成为普通大国中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国家。这两个因素的主要影响是:

(1) 美国防范中国和美国对中国合作需求降低导致战略安抚策略难以减缓安全压力。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相对实力明显上升的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美国愈加担心中国在安全领域获得相对收益,进一步威胁其主导地位,因而不愿采取实质行动满足中国的安全关切,相反利用可能的机会牵制中国。此外,冷战后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增强了其单边行动的能力和决心,降低了在安全领域争取中国合作的需求。因此,中国的战略安抚策略减缓安全压力的效果不明显。(2) 美国希望避免与核大国发生冲突和美国的实力优势决定了在关乎中国生存的安全问题上适度的战略强制效果一般,但好于战略安抚。美国的体系主导地位决定了其核心利益是维持体系稳定,尽量避免与核大国发生直接武装对抗,尤其是在关系到普通大国生存利益的安全问题上。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适度的战略强制表现可以展现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同时说明目标的有限性,争取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行动。相反,战略安抚则会导致美方错误判断中国的政策立场,从而执行对中国更为不利的政策。但由于中美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较为明显,中国的战略强制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采取过分激烈的手段,效果会适得其反。(3) 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市场吸引力增大,加之经济领域合作对中国的相对收益不明显,因而经济诱导策略缓解经济矛盾及相关的政治压力效果明显。但由于中国对美贸易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程度,中国尚没有能力通过经济制裁实现政治安全目标。

上述分析结论给未来中国制定对美政策的启示是:第一,要充分意识到冷战后中美相对实力变化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不能过分寄希望于通过战略安抚政策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在关乎中国生存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中国应当采取与自己实力特点相适应的战略强制政策,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提高威慑效力,争取尽早遏制“台独”发展过快的势头。第二,在其他政治安全问题上,坚定不移地推进中美之间的合作,贯彻战略安抚政策,尽力维持中美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美国对中国相对获益的关切。第三,保持中美之间良好的经济合作势头,保证中美之间正常的交流和接触,为化解政治安全关系分歧奠定最基本的联系渠道。

## 作者简介

**孙学峰** 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7年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与人合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

电子信箱:sunxf02@mails.tsinghua.edu.cn

**周方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5年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1998年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1998年至2002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理论·方法·模型》(2001年)。

电子信箱:zfy02@mails.tsinghua.edu.cn

**陈琪**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博士。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2002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毕业,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著有《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2004年)。

电子信箱:chenqi@mail.tsinghua.edu.cn

**许田波 (Victoria Tin-bor Hui)**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助理教授。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著有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子信箱:thui@nd.edu

**王学东**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博士。1996年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1999年和2004年在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对外关系。

电子信箱:wangfatty@eyou.com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任 *Political Science* (Wellington)、*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 (Denver) 编辑,著有《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当代政治学的新范畴》,以及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Collec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China; Reform, Identi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等。

电子信箱:cyshih@ntu.edu.tw